

原始时期人形陶器的研究对当代陶艺创作的启示

卓欣雅

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 300141

DOI:10.61369/EDTR.2025080012

摘要 : 原始时期人形陶器立足于史前的自然土地, 连接着当代陶艺的可能性, 本文以原始时期人形陶器为研究对象, 按其形态与功能进行分类梳理, 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并分析其发生与发展的多重影响, 包括先民对自身的认知与审美意识的萌芽、实用需求的推动, 以及原始宗教与崇拜观念的作用。最后结合笔者部分个人作品,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形式语言的共通性及“器以载道”的象征传统三个维度, 探讨原始时期人形陶器在当代陶艺创作中的借鉴价值、应用路径及启示意义。

关键词 : 原始时期; 人形陶器; 当代陶艺

Research on Humanoid Pottery from Primitive Tim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Creation

Zhuo Xinya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Abstract : Prehistoric natural land is the source of primitive humanoid pottery, which relates to the potential of modern ceramic art. Primitive humanoid pottery is th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which categorizes and arranges it based on its shape and function, condenses it into three primary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examines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These factors include early humans' developing self-awareness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he need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and the influence of primitive religious and worship ideas. Finally, combined with som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wor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erence value, application pathways,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primitive humanoid pottery in contemporary ceramic cre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universality of formal language, and the symbolic tradition of "Using Vessels to Convey the Dao".

Keywords : primitive period; human-shaped pottery; contemporary ceramics

引言

原始时期人形陶器的出现代表了古代先民开始将自身的感觉与感受投射于陶器的造型创作之中, 对人自身形象的塑造成为了原始陶器的一大主题。在这个过程里, 人的形体被无意间作为“按照美的规律来创作”的最直接的参照体系^{[1][2]}。“器”与“人”的关系, 甚至是“器”与“道”之间的关系或隐或现的显露出来, 对于二者之间的新的思考与研究或许能帮助我们在当代陶艺创作中获得新灵感、新启发。

一、原始陶器概述

原始陶器诞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 是人类最初将自然材料经过人为加工制作而成的物品, 也是最初同时具有审美特性与功能特性的物品。原始时期人形陶器是原始陶器的重要分支, “人形陶器”是将器形作为人体来造型的、以人作为塑造对象的陶器^{[3][4]}, 是指具有人的特征, 如器表浮雕人像、器纽塑造成人头或器身模仿人形的一类陶器^[5]。中国出土的原始人化陶器多在彩陶器形的基础上塑造人体, 且以人面和人身形状居多, 部分结合几

何、人物的纹样加以装饰。

通常人形陶器会结合陶器的自身造型特点, 将器形按照人体的大致比例与轮廓来塑造, 各个人体部分会根据功能分类与位置情况单独或组合式出现。“按人像与器物依存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完整的人体雕像或人头、陶人面等。二是在陶器的盖、口、肩、腹等部位装饰人头或其他身体部位及器官。三是将整个实用器皿塑造成完整人形”^[6]。

以实地考察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陶小头壶(如图1)为例, 其陶壶的顶部塑造了一张人面, 五官镂空, 面部微微朝上,

它以器口为人头，器体则成为了人的躯干，陶壶整体的造型似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塑像，造型别致，细致且生动，还具有一定实用意义；还有四坝文化的人形彩陶罐（如图2），则是将整个陶罐塑造成了人体，以头为口、以臂为把、以身为器、以足为底，器形即人形。



图1 陕西历史博物馆彩陶小头壶 卓欣雅摄 2024年



图2 四坝文化人形彩陶罐 甘肃文旅2020年

诸如此类将器形与人形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深刻体现了原始时期的器物人格化，并且以人形为参照的意识已经渗透进了器形的造型创作之中，人形之美成为了实现器形之美最现实的蓝本之一，“器”与“人”之间的形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原始时期人形陶器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原始时期人形陶器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早期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审美表达。原始时期，人们对造型的概念来源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与模仿，包括陶器的制作，也是通过“象天法地”的模仿活动中先观象而后制器得到的^[4]。人形陶器的出现，深刻体现了原始时期人对自身的一种观察和模仿。这种以人为对象的意识和创作，包含着当时人对自身的某种认识和理解，它最初或许是以偶然性的形式出现的，但随着对自身的认识与审美需求的不断发展，最终将成为必然性。

“马斯洛需求理论”指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的需求之后，人们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审美艺术的需要，而这从原始人类

来看也是一样的，因此原始陶器造型的美化、演化也是一种必然。回到原始人形陶器，人对自身欣赏或许是一种本能与天性，罗丹说：“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人体更有性格”“人体，上身细，臀部宽，像一个精美的花瓶，蕴藏着未来生命的壶”。人体自身的美应该是彩陶造型美的重要参考，陶器的曲线与人体的曲线相关联^{[1][14]}，因此人体的美成为了陶器制作最现实而又最理想的蓝图之一。器形的人化，是原始先民表现自我的最初意识，以人体为参照对器形的美化，将推动人形陶器朝着人形之美、人性之美不断演化。

第二，实用性需要的推动。本文的“实用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代表功能性需要，二是代表心理性需要。首先，是功能性需要。原始时期的陶器首先是满足功能的，在原始社会生存、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功能的需要远大于审美的需要，一切都建立在人类的实际物质生活基础之上。而原始时期的人形陶器，多是建立在原有陶器器形的造型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多是在保障器物实用性功能的前提下塑造人形与人像的。随着原始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实用性范围不断扩大，陶器造型的形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并逐渐美化。上文提到，人形的美是陶器演化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因此功能性需要的推动也使人形陶器的造型与形式不断丰富与多样。

其次，是心理性需要。心理的需要是人类最本真、最真实的需要。“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古代先民将物人格化，并赋予一种想象的超自然的力量，以企求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5]。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裸体浮雕彩陶壶（见图3），是男性、女性的复合体，人像腹部既有男性生殖器又有女性生殖器，有象征男女同体的含义，富含神秘的性崇拜与宗教色彩，使其成为了人的某种精神的化身，代表着生育与丰产。原始陶器表现出来的人的愿望和需求是自发的、自由的、质朴的本能，是原始人类的本质需求。人的心理性需求赋予了人形陶器超越人的力量，并且表现出某种原始宗教与原始崇拜的意义，而这也是一种“实用性”的需要。



图3 裸体浮雕彩陶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三，原始宗教与原始崇拜的影响。“远古的人体造型艺术，萌发着人类尚处于童年阶段的史前时期，它是插着原始宗教（或巫术）的翅膀而降临人间的”^[6]。原始先民视彩陶器物有灵，器形即神形，有的是崇拜物，有的带有神秘色彩，有的甚至是巫术的道具，这与原始宗教密切相连，也与原始崇拜密切相关，包括动

物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认为女性代表一种神圣和先知，对女性形象的崇拜深刻体现在人形陶器的制作中，将女性形象与陶器相结合以寄托某种愿望，包含少女、少妇尤其是孕妇、老年女性等形象。原始陶器取之于土地，是与自然最贴近的器物，因此人形陶器不单单作为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史前对于土地的崇拜，甚至对于自然的崇拜^[7]。

原始宗教和原始崇拜的影响还体现在纹样装饰上，特别是与人形相联系的纹样。在甘青地区陶器中所绘制的神人纹、女阴纹、人面纹等纹样，被认为是史前图腾崇拜的纹样类型^[7]。“图腾”在原始陶器的装饰中具有普遍意义，例如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一件人头彩陶罐（见图4），将罐口塑造成人面的基础上，在罐身处进行人形图腾的纹样装饰，人面罐口与人纹装饰相互呼应，呼唤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保护自己及族群，深刻体现了古代先民的意志感情。



图4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人头彩陶罐 青海省文化旅游2024年

三、当代陶艺创作与原始时期人形陶器的关联性

原始陶器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化，逐渐发展成中国现当代陶瓷百花齐放的面貌。“从传统陶艺自身发展的观念看，它的产生起源于原始状态和其所负载承载时代的精神品质，以及顽强地持续一种人文热情，与当代文化是共同而相联系的”^[8]。这种创作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联性。不管陶瓷如何演变，它终究还是关于人、水、火和泥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与研究^[9]。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原始时期先民在制作陶器，尤其是人形陶器时，人与泥土的距离是无限紧密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无限贴近的，同时原始先民付出的感情是更为朴实纯净的，与大自然的联系也是更为亲近的。因此，原始时期陶器制作的灵感永远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发展的动力也是来源于人与自然的。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始终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天、地、人互惠共生，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髹饰录》提到：“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器是人工与天工合一的艺术。发展到当代陶艺创作中也是如此，陶艺扎根在了远古的厚土上，其本质仍然体现着原始陶器最朴素、最原始的追求，即是对宇宙中人和自然的认识与超越。陶艺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哲学观“天

人合一”的最具体最完美的体现^[10]。以笔者的陶艺作品《清潭》为例（见图5），作品塑造了一具侧躺的女性人体，使其置身于一洼清潭之中，身体与流水相接相连，人与自然相合相生，自由地像是要融进清潭之中，形成了一幅清秀纯净的场景。作品整体以泥片成型的方法制作而成，成型过程需在维持泥片自然本性的基础上施加压力形成女人体形，整个制作的过程也正是平衡人与自然二者和谐共处的过程。作品深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来表达笔者对人与自然的理解与思考。



图5 《清潭》卓欣雅 2023年

第二，形式美语言的互通性。通过原始人形陶器，可以看到原始时期高度的艺术提炼和概括，达到了造型与装饰的“抽象化”，也就是形成了形式美的语言。形式美的法则是陶艺创作中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对比与统一、节奏与韵律、比例和尺度、对称与均衡贯穿于陶艺创作的始终，指导陶艺艺术家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例如，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见图6），内饰三组舞蹈纹，每组五人，步调一致，牵手而舞，极具节奏韵律感；还有在大部分的人首瓶、人首罐中，人形和器形形成对比，在对比里又蕴含着统一，实现了人头与器身在比例尺度上的完美，也达到了视觉上的对称与平衡。由此看出，原始人形陶器与现当代陶艺创作的形式美语言是互通的，我们能够在原始人形陶器中找到独特的形式规律，并运用于陶艺创作之中，创造出独具个性的陶艺作品。



图6 舞蹈纹彩陶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同样以笔者作品《清潭》为例，作品以较抽象的形式来描绘清潭湖水的形态，在其中施加蓝色冰裂釉，形成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深有浅的涟漪的动感形态，符合形式美语言的共性。同时，作品中女人体的部分显然不符合真实女性的身材比例，笔者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段，展现作品造型的节奏和韵律感，从而突出作品对女性抱有崇高敬意的主题。

第三，“器以载道”的象征性。“道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相对应的基本范畴，“道”是无形的、抽象的、本质的精神观念

与思想存在，“器”则是有型的、具象的、感性的人为事物^[11]，道器关系就是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道器关系构成了古代器物美学的核心。在陶艺创作中，陶艺作品是具体事物的“器”，作品中蕴含的哲学道理、价值观念则是“道”。所谓“器以载道”，就是要通过作品有型的“器”来承载无形的“道”，通过有型的创作作品来承载无形的精神观念与思想存在，使器物凝结社会与文化的价值与内容。

原始时期虽然还未出现“器以载道”的哲学理念，但是通过上文对原始人形陶器的探究，我们能从中发现“器”与“道”的痕迹。在原始社会，人形陶器是先民们日常所用之“器”，除了实用功能以外，它同时承载着原始人类最本真、最原始的需求，也承载着原始宗教、原始崇拜的寓意，人形陶器上寄托着人人相信而无影无形的“神”，而这即是“道”的存在。因此原始时期的人形陶器具有“器以载道”的象征性，并一以贯之地贯穿于整个陶艺发展的历史之中，尤其在以表现个人情感价值的现当代陶艺创作中最能得到体现。

当代陶艺创作是对个人情感的宣泄、对人文情怀的传达、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人类本源的探究、对事物本质的寻找，通过

其有限的造型与形式承载人们无限的精神与思考。作品《清潭》以女人体为媒介正是对这种人文情怀、人类本源的探究，对母系关系的思考，对纯粹和本真的寻觅。原始人形陶器中“器以载物”的象征性成为其运用在当代陶艺创作中最深刻的路径，原始人类最质朴的愿望与追求蕴含于艺术创作之中，引导艺术家创作出最纯粹的、最具生命力的作品。

四、结语

当代陶艺创作，吸纳了来自世界艺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在中国当代陶艺的创作进程中，设计师应听到来自过去、来自原始时期的呼唤，并找到原始人形陶器与当代陶艺中之间的人与自然的链接、形式美语言的互通、“器以载道”的象征，从而去创作真诚而纯粹的艺术作品。在新的作品的创作中应从原始的纯粹与本真出发、从民族的语言与特性出发、从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出发，引领当代陶艺创作找到新思路与新路径，最终影响并推动中国陶瓷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程金城. 中国彩陶艺术论 [M]. 甘肃: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 [2] 郭颖珊. 西北地区史前时期人形陶器来源初探 [J]. 北方文物, 2024, (03): 48–56.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4.03.008.
- [3] 李胜军. 解读原始社会的密码——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赏析 [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 (07): 199–201.
- [4] 王立夫. 道与用—器物的逻辑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0.
- [5]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 [6] 杨泓. 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 [J]. 文物, 1987, (01): 54–65.
- [7] 王迎迎. 史前甘青地区人物形陶器研究 [D]. 兰州财经大学, 2022.
- [8] 姜波. “超越泥性”的阐释——关于中国当代陶艺的现代文化理念建构 [J]. 中国陶瓷, 2008, (08): 72–73+69. DOI:10.16521/j.cnki.issn.1001-9642.2008.08.023.
- [9] 叶昵蘋, 郎璠. 原始陶器艺术的精神形态对现代陶艺创作的启发 [J]. 陶瓷科学与艺术, 2023, 57 (01): 16–17. DOI:10.13212/j.cnki.csa.2023.01.003.
- [10] 董萍. 人与自然的和谐——谈现代陶艺的创作与欣赏 [J]. 陶瓷科学与艺术, 2002, (03): 50–52.
- [11] 李龙生. 道器之辨——兼论中国古代器物美学思想 [J]. 中国文学批评, 2018, (03): 55–66+158.